

多维度距离下的中国文化产品贸易

黄玖立¹ 周泽平²

(1. 南开大学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天津 300457; 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 510085)

摘要: 文化产品贸易既是国际贸易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跨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本文从经验上考察了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多维度距离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基于1999—2010年法国CEPII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文化产品尤其是核心文化产品的出口贸易流量主要受文化、制度等距离因素的影响,地理、经济等传统距离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以遗传距离作为文化距离的工具变量克服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关键词: 文化产品贸易;文化距离;政治距离;制度距离;遗传距离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01(2015)05-0093-08

DOI:10.13269/j.cnki.ier.2015.05.010

一、引言

文化产品具有物质和文化符号双重属性,其对于一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超出了一般商品。在强调合作、互信和共赢的当今世界,文化认同是国与国之间保持良好国际关系包括良好经贸关系的重要前提,而文化产品贸易则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是促进伙伴国之间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起,中国的名义GDP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2013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跃居全球第一。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文化影响力等软实力指标却相对滞后。相形之下,欧美发达国家则一直在积极建设文化产业。早在1996年,美国的文化产品就成为其首要的出口报关项目,文化产品出口日益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事实上,如果进行纵向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非常迅速。根据《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13)》的统计,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总产值突破4万亿元,在GDP中的占比已达到8.5%。然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能力却相对落后,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也缺乏类似好莱坞、迪斯尼这样的带有鲜明文化符号的国际文化品牌。“中国制造”本身还难以完成传播中国文化进而获得其他国家文化认同的重任。鉴于此,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只有借助官方机构实行。目前,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已在全球范围内铺展开来,成为汉语和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然而,从长期来看,文化影响力的推动如果仅仅依靠非盈利机构途径,不仅不可持续,而且效率也比较低下。因此,甄别影响文化产品贸易的因素进而提升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竞争力十分重要。

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起步早、规模大而且发展规范,因而,相关的研究也开展得较早。贸易领域

收稿日期:2015-05-25

作者简介:黄玖立(1973—),男,河南光山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周泽平(1991—),男,安徽安庆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JL05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JD020);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NCET-13-0298)

的文献集中于研究双边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程度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包括对语言^[1]、双边互信^[2]、双边价值观念^[3]、双边殖民联系^[4]等方面与货物贸易之间联系的研究。如 Schulze^[5]研究了文化壁垒对于商品市场经济往来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差异引起文化壁垒并影响商品市场的一体化,进而影响商品经济的往来。结合 Felbermayr and Toubal^[6]关于文化相似性对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 Disdier *et al.*^[7]将 Schulze 的结论推广到国际贸易领域,构成了文化产品贸易影响双边文化联系,进而影响双边货物贸易的理论基础。该研究将文化产品贸易作为文化相似度的替代指标,使用最新的引力模型来研究这一问题,认为文化产品贸易的增加能够促进文化认同,从而提高双边贸易偏好,促进总体贸易。

国内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产品贸易的研究起步较晚,部分研究是围绕着文化产业发展^[8-9]及文化产业发展对于总体产业升级的意义^[10-11]展开的。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的研究^[12-13]逐渐增多。曲如晓等^[14]利用中国与9个国家和地区1992—2008年的双边文化贸易数据研究了经济规模、居民购买力、科技水平与文化距离对双边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刘杨等^[15]则利用 OECD 国家的贸易数据,考察了地理、文化距离与消费成瘾性对于两国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法国 CEPII 贸易数据和引力模型,考察了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制度五个维度的距离对于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剖析影响文化产品出口的条件,进而对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给出政策建议。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不随文化产品贸易变动的遗传距离作为工具变量来进一步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的创新点包括如下两点:首先,本文立足于中国贸易数据,首次多角度分解距离,从不同维度考察距离因素对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充分考虑了文化产品贸易的特征,考虑了物质、文化双维度特征对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其次,本文构建了工具变量,对模型做了稳健性检验。

二、估计模型

(一) 模型及变量

文化产品的生产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能够大规模复制、能够明显降低平均成本,同时版权等也形成了行业进入门槛。这意味着,文化产品贸易具有明显的不完全竞争特征,适用产业内贸易的分析框架。鉴于此,有学者基于垄断竞争模型探讨文化产品的贸易行为^[16]。沿用这一思路,本文通过垄断竞争框架下的引力模型来阐释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并且在文化折扣对消费者效用存在影响的假设前提^[17]下纳入文化、政治、制度距离等因素进行分析。本文模型初步设定如下:

$$\ln c_trade = \beta_0 + \beta_1 \ln gdp + \beta_2 \ln gdp_pc + \beta_3 \ln dist + \mu \quad (1)$$

其中 c_trade 是中国对目的国和地区文化产品出口的贸易额,本文参照 UNESCO 给出的文化产品内容具体的定义表对 CEPII 数据库中的中国对外贸易数据进行编码对照筛选,以确定文化产品出口贸易额的具体数值。 $dist$ 即为地理距离。 gdp 为伙伴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_pc 为伙伴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标准的引力模型变量。这些变量均取自然对数进入模型。

在此基础上,我们考虑文化产品的文化属性。我们根据 Kogut 和 Singh^[17]所提供的计算文化距离的方法构建了文化距离(cd)及制度距离($newid$)。文化距离(cd)用 Hofstede^[18]提供的文化维度数据,将文化细分为五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分别计算中国与目的国之间在每一维度分数方面的差,然后将这种差异加权平均得出中国与目的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数据。具体公式如下:

$$cd_{jh} = \sum_{i=1}^5 \{ (I_{ij} - I_{ih})^2 / V_i \} / 5 \quad (2)$$

cd_{jh} 表示母国 h (即中国) 对外国 j 的文化距离, i 表示文化的维度, I_{ij} 表示外国 j 在第 i 维的分数, V_i 表示第 i 维的方差。所用的文化维度的具体内容包括: 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男性化和女性化、不确定性规避及长期取向和短期取向等五方面。

制度距离(*newid*)采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构建的“世界分地区国家自由评级”数据(Freedom in the World Country Ratings by Region),通过将一国的制度分为公共权利(Public Rights, PR)、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 CL)两项分指标分别以0~7分的评分制赋值,共同构成了各国、各地区制度自由度指标,再将自由度指标通过Kogut和Singh^[17]计算得出距离数值。

文化产品贸易多带有文化输出意义,因此政治性审核程序的差异可能也构成一大障碍。鉴于此,本文根据文献中常用的类似文化距离的计算方法,使用世界银行集团提供的全球治理指标报告中的WGI数据^[18]计算了6个维度的政治距离(*id*)^①以反映行政因素对于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此外,文化产品贸易仍然从属于货物贸易范畴,具有物质属性,因而经济自由度间的差异也必将对此产生影响,故而构建地理距离(*dist*)与经济距离(*ed*)用来衡量这种差异。这样,本文最终使用的模型扩展如下:

$$\ln c_trade = \beta_0 + \beta_1 \ln gdp + \beta_2 \ln gdp_pc + \beta_3 \ln dist + \beta_4 ed + \beta_5 cd + \beta_6 newid + \beta_7 id + \mu \quad (3)$$

(二) 内生性及工具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文化产品贸易,它有可能影响作为解释变量的文化距离:直观上,两国之间的文化产品贸易越频繁,文化差距有可能越小。此外,上述估计模型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解释变量。这意味着,上述估计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若真如此,则估计系数可能是有偏和非一致的。

鉴于此,我们构建了遗传距离(*gd*)作为文化距离(*cd*)的工具变量。我们借鉴Spolaore和Wacziarg^[20]的方法,对各国、各地区的民族人口比率进行加权计算出各国的民族构成(遗传特征),这一指标反映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特质,以及由此而来的短时间内不随一般时间变化的文化、制度特征^[21]。进一步地,根据各国不同的民族构成,我们计算出不同国家间的遗传距离,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gd = \sum_i \sum_j s_i s_j d_{ij} \quad (4)$$

*gd*表示两国相对遗传距离, s_i 、 s_j 分别表示两国所包含的*i*民族、*j*民族所占总体民族比率, d_{ij} 则表示*i*民族与*j*民族之间的遗传距离,*gd*是不同民族间距离加权得出的指标。具体的民族间遗传距离指标有多种计算方式,本文采用以 F_{ST} 方法计算的遗传距离(*fst_dist_weighted*)和以Nei标准遗传距离算法计算的遗传距离(*nei_dist_weighted*)作为工具变量^[22]。综上所述,模型中所有主要变量及辅助变量的定义、构建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名	代码	定义
文化产品贸易额	<i>c_trade</i>	数据来源:CEPII数据库中的BACI贸易数据
双边经济规模	<i>gdp</i>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目的地国购买力	<i>gdp_pc</i>	采用人均 <i>gdp</i> 作为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地理距离	<i>dist</i>	数据来源:CEPII数据库gravity_cepil数据
文化距离	<i>cd</i>	计算方法来源:Kogut and Singh ^[17] ,数据来源:Hofstede ^[18]
制度距离	<i>newid</i>	计算方法来源:Kogut and Singh ^[17] ,数据来源:Free House
政治距离	<i>id</i>	计算方法来源:Kogut and Singh ^[17] ,数据来源:Governance Matters VIII ^[19]
经济距离	<i>ed</i>	计算方法来源:Kogut and Singh ^[17] ,数据来源:美国传统基金会(www.heritage.org)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标
遗传距离	<i>gd</i>	计算方法与数据来源:Spolaore和Wacziarg ^[20]

三、变量统计分析

(一) 中国对外文化产品贸易

中国对外文化产品贸易所呈现的特征,已有部分文献进行了阐述,例如曲如晓等^[14]的研究认为我国对外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具有增速快但占比低、核心文化产品比例不足及出口市场集中三大特

征,本文的数据也支持这一观点。此外,本文认为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还存在着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文化产品出口贸易(*c_trade*)与总体货物出口贸易趋势一致。总体上,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增长速度开始大幅提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受到冲击,但随着危机的逐步消除,又出现了V字型的大幅逆转。这种一致性充分表明了文化产品的物质属性,文化产品贸易始终归属于货物贸易范畴。

第二,我国文化产品对外出口布局狭窄,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地区),具有很强的经济导向性,忽视了文化传播效率很高的发展中国家。占据我国文化产品贸易目的地国和地区前5位的分别为美国、香港、德国、日本以及英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对美国、香港和德国出口额就占到总体出口贸易额的50%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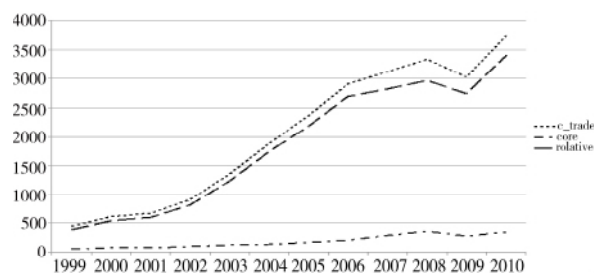


图1 1999—2010年间文化产品
对外贸易情况(单位:亿美元)

表2 1999—2010年中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主要目的地国和地区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第1位	美国	香港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第2位	香港	美国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第3位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德国	英国	德国	日本	日本	德国	德国	德国
第4位	德国	德国	英国	德国	英国	德国	日本	德国	德国	荷兰	英国	英国
第5位	法国	英国	德国	英国	日本	日本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日本	日本

(二) 变量统计分析

本文样本数据的时间维度为1999—2010,贸易对象国多达近200个。但是,由于文化距离、制度距离等数据的样本数量限制,有效的样本数量为448个,可以看出总体的数据结构为不平衡的短面板数据。表3报告了总体样本中的基本变量的统计结果,需要注意的是该样本统计结果包含了数据的整体情况,而非仅仅是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lnc_trade</i>	2263	9.633	3.538	0.03	18.425
<i>lncore</i>	2149	7.604	3.168	0.001	16.186
<i>lnrelative</i>	2244	9.491	3.564	0.03	18.312
<i>lngdp_pc</i>	2071	7.959	1.617	4.437	11.464
<i>lngdp</i>	2081	9.72	2.411	3.296	16.484
<i>lndist</i>	2263	9.003	0.546	7.025	9.858
<i>ed</i>	2357	1.596	1.332	0	9.936
<i>cd</i>	620	2.69	1.172	0	5.125
<i>id</i>	620	2.294	1.756	0	6.327
<i>newid</i>	2482	3.408	2.886	0	8.563

最终参与回归的样本数据。从总体描述可以看出,文化距离(*cd*)和制度距离(*id*)的数据较少,但这两个距离变量恰好是本文的考察重点,因此我们只能对总体数据进行取舍。

在上述统计样本的基础上,我们对样本中的各变量进行了两两相关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

表4 变量的相关系数

	<i>lnc_trade</i>	<i>lncore</i>	<i>lngdp</i>	<i>lndist</i>	<i>lngdp_pc</i>	<i>cd</i>	<i>newid</i>	<i>id</i>	<i>ed</i>
<i>lnc_trade</i>	1.000								
<i>lncore</i>	0.961	1.000							
<i>lngdp</i>	0.925	0.928	1.000						
<i>lndist</i>	0.000	0.035	0.011	1.000					
<i>lngdp_pc</i>	0.327	0.343	0.349	-0.071	1.000				
<i>cd</i>	0.097	0.127	0.113	0.426	0.476	1.000			
<i>newid</i>	0.160	0.185	0.201	0.203	0.601	0.561	1.000		
<i>id</i>	0.198	0.210	0.193	-0.012	0.850	0.522	0.695	1.000	
<i>ed</i>	0.191	0.211	0.166	-0.023	0.719	0.498	0.621	0.845	1.000

初步的结果显示:文化产品出口贸易额与传统的引力模型中的市场规模(gdp)和消费能力(gdp_pc)高度相关,与地理距离不相关。除此之外,文化产品贸易额与文化、制度、政治、经济距离都具有不同的相关性(相关系数都大于0.09),这与数据的缺失相关。总体而言,初步的相关性检验表明,除地理距离以外的各维度距离与文化产品贸易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四、估计结果

(一) 多维度距离与文化产品贸易

接下来,我们以模型(3)为基础进行最小二乘(OLS)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首先,我们将传统的引力模型变量纳入回归,包括经济规模($\ln gdp$)、人均收入($\ln gdp_pc$)以及地理距离($\ln dist$),回归结果为列(1)。从结果可以看出,市场规模以及消费能力对于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而地理距离的影响则是负向的。这意味着目的国的经济规模和高收入水平都有利于文化产品的出口,而地理距离不利于文化产品的出口贸易。

其次,我们将经济、文化、制度、政治距离纳入估计,列(2)与列(3)分别对应混合面板和固定效应面板估计结果。由列(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纳入多维度的距离后,地理距离的作用在统计上就失去了显著性,同时文化距离(-0.449)和制度距离(-0.048)对于总体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反向作用。偏向行政因素的政治距离并未对文化产品出口贸易产生显著影响,这说明国内的行政审批差异可能被统一化的国际报关程序所抵消,而偏向意识形态的文化、制度差异才构成了文化产品贸易的真正障碍。

然而,列(3)的回归结果表明:当我们将模型使用固定效应方法进行估计时,结果就呈现出了偏离。人均收入($\ln gdp_pc$)的影响呈现出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此外原本显著的制度距离($newid$)变得不显著,原本不显著的政治距离(id)反而变得显著。然而,考虑到固定效应模型中不随时间变动的地理距离特别是文化距离变量的缺失,再加上各维度距离随时间变化幅度很小,因此我们采信混合回归估计的结果,即传统的地理距离对总体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文化、制度差异是阻碍文化产品贸易的重要因素,政治距离对于总体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进一步地,列(4)、(5)报告了以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量作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首先,列(4)、(5)之间的差异与前述(2)、(3)回归结果之间的差异基本一致。我们认为,这种差异是由于样本数据波动较小和重要变量缺失所造成的,因此,本文以列(4)的回归结果作为依据展开分析。可以看出,当我们加入新角度的距离变量后,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的作用并不显著,这凸显了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其次,与总体文化产品出口贸易额的回归结果相比,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和政治距离的显著性都大幅提升,显示了相比较文化属性较弱的总体文化产品贸易,核心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受到意识形态距离的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政治距离(id)的估计系数为正,这也是符合逻辑的。中国的行政效率和政治

表5 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1)	(2)	(3)	(4)	(5)
	$\ln c_trade$	$\ln c_trade$	$\ln c_trade$	$\ln core$	$\ln core$
$\ln gdp$	1.220 *** (0.016)	0.918 *** (0.034)	6.674 *** (0.714)	0.973 *** (0.028)	4.619 *** (0.682)
$\ln gdp_pc$	0.117 *** (0.024)	0.452 *** (0.0746)	-4.786 *** (0.747)	0.372 *** (0.061)	-2.808 *** (0.713)
$\ln dist$	-0.448 *** (0.061)	-0.137 (0.097)		-0.0740 (0.079)	
ed		0.045 (0.063)	-0.081* (0.043)	0.005 (0.051)	-0.058 (0.041)
cd		-0.449 *** (0.058)		-0.247 *** (0.047)	
$newid$		-0.048* (0.028)	0.030 (0.039)	-0.08510 *** (0.023)	-0.050 (0.037)
id		0.020 (0.059)	0.494 *** (0.090)	0.102 ** (0.048)	0.212 ** (0.086)
Constant	1.137* (0.594)	0.451 (0.960)	-25.540 *** (1.971)	-3.271 *** (0.786)	-20.290 *** (1.881)
Fixed effect	NO	NO	YES	NO	YES
Observations	2,071	446	446	446	446
VIF - max	1.50	5.51		5.51	
R - squared	0.822	0.780	0.826	0.847	0.795

注:***、**、* 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审查分值较低,较大的政治距离,意味着目的国的行政效率较高,显然有利于中国文化产品的市场进入。

最后,考虑到模型的回归结果可能受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影响,本文对模型进行了 VIF 检验,结果为表 5 中 VIF-max 栏。可以看出方差膨胀系数的最大值(VIF-max = 5.51) 并未超过 10,即说明模型并未受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影响,结果是稳健的。

(二) 内生性与遗传距离

如前所述,文化产品的附加值较高,因此,文化产品对外出口的同时,会伴随着文化价值的输出。这种文化输出会进一步降低双边的文化折扣,进而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因此可以看出文化产品对外贸易会产生一种循环影响机制,这种机制即为内生性的来源之一。另外,由于距离维度的不全面以及数据构建的粗线条所导致的变量遗漏和变量偏误等问题是模型内生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解决内生性的一个最为有效的方法是构造工具变量,本文则利用 Cavalli-Sforza *et al.*^[2] 测算的方法,分别利用 F_{ST} 法和 Nei 标准遗传距离计算法计算了中国与目的地国之间的遗传距离,以此作为文化差异的工具变量对模型做了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6。

Panel A 报告的是第二阶段回归的结果,Panel B 则报告了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2)分别展示了以 F_{ST} 法构造的遗传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列(3)、(4)中的工具变量则是以 Nei 标准遗传距离计算法计算的结果。此外,奇数列与偶数列的第二阶段回归的因变量分别为总体文化产品出口额(lnc_trade)及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lncore$)。回归结果表明,前述的回归结果是相对稳健的,文化距离对于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的折扣影响是存在的,并且在剔除内生性影响后,相对于前述回归中的结果(-0.247),文化距离的影响作用是显著增加的(-2.247)。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考察工具变量的使用是否合理。工具变量的使用有两项基本条件:一是是否存在内生性,以及使用工具变量是否优于 OLS 的结果。我们对上述四个模型分别做豪斯曼检验,

表 6 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Panel A	(1)	(2)	(3)	(4)
第二阶段估计结果	lnc_trade	$lncore$	lnc_trade	$lncore$
cd	-1.931 *** (0.527)	-1.789 *** (0.523)	-3.383 *** (1.090)	-2.247 *** (0.732)
$lngdp$	0.795 *** (0.070)	0.845 *** (0.071)	0.674 *** (0.137)	0.807 *** (0.093)
$lngdp_pc$	0.805 *** (0.173)	0.739 *** (0.183)	1.150 *** (0.350)	0.848 *** (0.244)
$lndist$	0.985 *** (0.377)	1.094 *** (0.373)	2.085 *** (0.789)	1.440 *** (0.528)
ed	0.132 (0.116)	0.0955 (0.111)	0.217 (0.202)	0.122 (0.139)
$newid$	0.031 (0.050)	-0.003 (0.049)	0.108 (0.090)	0.0212 (0.061)
id	0.142 (0.110)	0.228 ** (0.102)	0.261 (0.190)	0.266 ** (0.128)
Constant	-7.993 *** (2.962)	-12.060 *** (2.938)	-16.270 *** (6.020)	-14.670 *** (4.074)
Observations	446	446	446	446
R - squared	0.457	0.482		0.233
Panel B	(1)	(2)	(3)	(4)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	cd	cd	cd	cd
$lngdp$	-0.087 *** (0.027)	-0.087 *** (0.027)	-0.106 *** (0.028)	-0.106 *** (0.028)
$lngdp_pc$	0.227 *** (0.050)	0.227 *** (0.059)	0.240 *** (0.059)	0.240 *** (0.059)
$lndist$	0.415 *** (0.101)	0.415 *** (0.101)	0.492 *** (0.102)	0.492 *** (0.102)
ed	0.015 (0.051)	0.015 (0.051)	0.031 (0.051)	0.031 (0.051)
$newid$	0.039* (0.022)	0.039* (0.022)	0.039* (0.023)	0.039* (0.023)
id	0.112 ** (0.047)	0.112 ** (0.047)	0.094 ** (0.047)	0.094 ** (0.047)
$fst_distance_weighted$	0.001 *** (0.000)	0.001 *** (0.000)		
$nei_distance_weighted$			0.004 *** (0.001)	0.004 *** (0.001)
Constant	-3.317 *** (0.885)	-3.317 *** (0.885)	-3.595 *** (0.938)	-3.595 *** (0.938)
Observations	446	446	446	446
R - squared	0.541	0.541	0.532	0.532
Hausman 检验	(1)	(2)	(3)	(4)
$\chi^2(1)$	29.000	47.240	68.790	45.790
Prob > χ^2	0.000	0.000	0.000	0.000

注:***、**、*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结果报告如表 6。可以看出,四个模型的豪斯曼检验结果的 p 值均小于 0.01,表明文化距离变量 cd 是内生的。该豪斯曼检验有效的前提是“同方差假设”,为此,我们对模型进行了 DWH 检验,检验的结果强烈拒绝了异方差的存在,因此检验也是有效的。二是工具变量是否能够作为内生变量的有效替代变量,即工具变量是否与内生变量相关及相关度如何。从使用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初步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工具变量在以文化距离(cd)为因变量的一阶段回归中 p 值都小于 0.01,可以初步判断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cd)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正式的检验结果报告如表 7。第(1)行及第(2)行分别检验了以 F_{ST} 方法计算的遗传距离($fst_dist_weighted$)和以 Nei 标准遗传距离算法计算的遗传距离($nei_dist_weighted$)作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可以看出以 F_{ST} 方法计算的遗传距离检验的 Shea's Partial 大于 0.04(0.049), F 统计量的 p 值为 0.0002,故而可以认定工具变量 $fst_dist_weighted$ 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然而,以 Nei 标准遗传距离算法计算的遗传距离的 Shea's Partial 不足 0.04(0.030), F 统计量为 9.574(没超过 10),但是 p 值为 0.0021,且最小特征统计量(Minimum eigenvalue)为 13.636,远大于对应的显著水平为 15% 的临界值($W_test(15\%)$) 8.96,因此也可以排除弱工具变量的零假设。

表 7 弱工具变量检验

	R-sq.	Adjusted R-sq.	Partial R-sq.	Robust F(1,437)	Prob > F	Shea's Par_R-sq.	Minimum Eigenvalue	W_test (15%)
(1)	0.544	0.536	0.049	14.546	0.000	0.049	22.514	8.960
(2)	0.535	0.527	0.030	9.574	0.002	0.030	13.636	8.960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1999—2010 年的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数据的研究显示,我国文化产品贸易受双边制度、文化距离的影响明显,充分体现了文化折扣对于文化产品贸易的不利影响,这种影响对于文化附加值高的核心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尤为突出。相反,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并未受传统的地理距离的影响,这—是由于文化产品本身的特点,二是传统的地理距离度量可能并不能很好地度量运输成本。此外,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的文化附加值低,且主要集中于收入水平较高的少数发达国家。

根据本文研究,我们的建议如下:首先,决策部门应该规范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文化产品品牌的建立,提高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的文化附加值。高文化附加值的核心文化产品的出口能够更好地促进文化认同,降低文化折扣,对于总体贸易和文化产品贸易的循环促进作用会更为明显。其次,缩短双边的制度、文化距离,促进双边认同,降低文化折扣。例如开展文化交流合作(如中俄、中法文化年)、接纳更多外国留学生等。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源于制度差异的文化交流障碍也会逐渐消除,这将有效地缩短制度距离,使我国文化产品贸易的总量和结构进一步优化。

参考文献:

- [1] Melitz, J., 2008, "Language and Foreign Trad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2(4): 667-699.
- [2] Guiso, L., P. Sapienza, L. Zingales, 2009, "Cultural Biases in Economic Exchang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3): 1095-1131.
- [3] Disdier, A. C., T. Mayer, 2007, "Je t'aime, moi non plus: Bilateral Opin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3(4): 1140-1159.
- [4] Rose, A. K., C. Engel, 2002, "Currency Unions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4(4): 1067-1089.
- [5] Schulze, G., 1999, "International Trade in Art",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3(1-2): 109-136.
- [6] Felbermayr, G. J., F. Toubal, 2010, "Cultural Proximity and Trad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4(2): 279-293.
- [7] Disdier, A. C., S. H. T. Tai, L. Fontagné, et al., 2010, "Bilateral Trade of Cultural Goods",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5(4): 575-595.

- 〔5〕李敏鹤. 我国电影产业出口竞争力分析〔J〕. 市场周刊, 2006(12): 45-46, 53.
- 〔6〕韩栋. 基于钻石体系的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4): 98-101.
- 〔7〕刘志彪.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端化: 基于“链”的经济分析〔J〕. 产业经济研究, 2012(3): 9-17.
- 〔8〕余娟娟.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演进机理与路径〔J〕. 产业经济研究, 2014(6): 31-40.
- 〔9〕朱文静, 顾江. 文化贸易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基于我国 1997—2008 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 现代管理科学, 2012(6): 15-17.
- 〔10〕李方杰. 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思考〔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0(12): 98-99.
- 〔11〕曲如晓, 韩丽丽. 中国文化商品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0(11): 19-31.
- 〔12〕刘杨, 曲如晓, 曾燕萍. 哪些关键因素影响了文化产品贸易——来自 OECD 国家的经验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11): 72-81.
- 〔13〕Hoskins, C., R. Mirus. “Reasons for the US Domi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levision Programme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0(4): 499-504.
- 〔14〕Kogut, B., H. Singh, 1988,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3): 411-432.
- 〔15〕Hofstede, G., 1991,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Berkshire: McGraw-Hill Professional.
- 〔16〕Kaufmann, D., A. Kraay, M. Mastruzzi, 2009, *Governance Matters VIII: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8*,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 〔17〕Spolaore, E., Wacziarg, R., 2009, “The Diffusion of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2): 469-529.
- 〔18〕Cavalli-Sforza, L., P. Menozzi, Piazza, A., 1994,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 ①六个维度的具体内容为: 话语权和问责制(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性(Political Stability)、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管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制(Rule of Law)、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 根据具体内容可知, 新构建的 *id* 更多偏向于政府政治环境和行政管理。

(责任编辑: 雨 珊)

The Trade Flow of China's Cultural Goods: Perspectives from Multi-Dimensional Distances

Huang Jiuli¹, Zhou Zeping²

(1. Center for Transnationals'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457, China;

2. China Guangfa Bank, Guangzhou 510085, China;)

Abstract: The trade of Cultural Good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national economy, but also the carrier of cross-country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empirically the impact of multi-dimensional distances on the export flows of China's cultural goods, that is, the distances of geography, economy, culture, political system and institution. We find with the CEPII data (1999—2010) that the export trade flows of China's cultural goods, especially the core cultural ones, are driven mainly by the distances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 while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distances such as geographic and economic distances is quite slim. We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endogeneity by using genetic distance as instrument variable for cultural distance.

Key words: trade of cultural goods; cultural distance; political distance; institution distance; genetic distance